



第七十五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 72(b)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问题，包括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发展权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转递发展权特别报告员萨阿德·阿勒法拉吉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33/14 和 42/23 号决议提交的报告。

* A/75/50。



发展权特别报告员萨阿德·阿勒法拉吉的报告

摘要

在本专题报告中，发展权特别报告员萨阿德·阿勒法拉吉从发展权的角度探讨了发展筹资政策和实践的国际层面。他强调四个关键领域。第一是多边开发银行和发展筹资机构实践中的参与、同意和获取信息。对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等关键原则以及环境影响评估和有意义的协商进程等实践进行了评估。第二个关键领域是调动国内和国际资源，其中包括非法资金流动、官方发展援助、公私伙伴关系等事项。特别审视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逃税和避税挑战，以及多边开发银行和发展筹资机构推动的公共筹资政策对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影响。

涉及的第三个领域是，将国际合作作为发展筹资和发展权的一项关键原则，将重点放在联合国主持下正在举行的关于发展筹资的政府间对话以及税务合作和融资贷款上。强调开展有效的国际税务合作以应对避税和逃税费用，扩大多边开发银行和发展筹资机构优惠贷款和赠款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筹资规模，以及域外义务的人权原则。第四，调查在对史无前例的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造成的全球经济影响方面的国际和多边应对措施。阐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迄今采取的步骤，同时具体说明对这些措施的规模和效力的关切，以及联合国各实体所强调的发展中国家筹资的迫切需要。着重说明非洲国家缺乏足够的财政空间采取适当的卫生和财政对策的情况。

特别报告员在结论中建议，将参与、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以及获取信息原则纳入发展筹资政策和实践，并在应对全球大流行病和执行《2030年议程》的背景下解决与调动国内和国际资源、公私伙伴关系和财政援助有关的挑战。通过有效执行关键的多边文书，如《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各项公约等加强国际合作。为解决非法资金流动问题，应设立一个包容各方、政府间的联合国税务机构，赋予其任务和资源，以确保为促进有效调动国内资源进行合作。为保护发展权，特别报告员呼吁对 COVID-19 大流行采取基于人权的对策。这一对策应包括一些关键举措，如持续增加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预算支持的快速支付，利用联合国作为一个政府间平台，讨论、分析和协调为克服疫情造成的挑战性经济和人权影响所需的多边应对措施和政策转变。

目录

	页次
一. 特别报告员的活动	4
二. 发展筹资和发展权的背景资料.....	4
A. 导言	4
B. 发展筹资和发展权的国际政策背景	5
三. 国际和区域两级的发展筹资实践.....	6
A. 参与、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以及获取信息	6
B. 调动国内和国际资源	8
C. 国际合作	12
四. 应对 COVID-19 大流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14
五. 结论和建议	17
A. 参与、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以及获取信息	17
B. 调动国内和国际资源	17
C. 国际合作	18
D. 应对 COVID-19 大流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18

一. 特别报告员的活动

1. 本报告系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33/14 和 42/23 号决议提交大会。
2. 在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上，发展权特别报告员萨阿德·阿勒法拉吉将向理事会提交一份专题报告(A/HRC/45/15)，从发展权的角度审视国家一级的发展筹资实践。他将强调良好做法，并审查在确保权利持有人有意义参与方面的挑战。报告最后将提出建议，探讨如何将发展权纳入资源调动、税务政策、参与以及获取信息和数据等领域。报告还将概述特别报告员在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7 月的活动。

二. 发展筹资和发展权的背景资料

A. 引言

3. 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33/14 和 42/23 号决议，发展权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是对发展筹资与发展权的交汇点进行审视。在《第三次发展筹资问题国际会议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第 2 段中，各国承诺执行三项任务：落实承诺并评估在执行《蒙特雷共识》和《多哈宣言》方面取得的进展；进一步加强为可持续发展筹资和普遍的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执行手段提供资金的框架；振兴和加强发展筹资后续进程，以确保各国承诺的行动得到落实并得到适当、包容、及时和透明的审查。
4. 如《发展权利宣言》第 3 条规定，各国对创造有利于实现发展权利的国内和国际条件负有主要责任，并有义务在确保发展和消除发展的障碍方面相互合作。根据同一条，各国在实现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时应着眼于促进基于主权平等、相互依赖、各国互利合作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并激励遵守和实现人权。在本报告中，特别报告员将审视广义上的发展筹资，这一概念涵盖多种不同的公共和私人、国内和 international 的资金流动，如国内财政收入、公共发展援助、汇款、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债。他还将从上述发展权原则的角度，审视《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所确立的发展筹资进程的某些方面。
5. 特别报告员指出，外债问题是发展筹资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在本报告中，特别报告员只是稍加涉猎，因为这一领域可参考国家外债和其他有关国际金融义务对充分享有所有人权尤其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影响问题独立专家的工作。
6. 特别报告员对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全球的影响深表关切。他呼吁各国在应对危机时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特别报告员还认识到这一大流行病将对发展筹资产生深远影响，并将在本报告中从发展权的角度审视其中一些影响。
7. 在本报告中，特别报告员详述了他于 2019 年 9 月提交人权理事会的关于切实落实发展权的指导方针和建议(见 A/HRC/42/38)。
8. 指导方针特别强调了权利持有人有意义地参与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的重要性。确保有意义的参与不仅意味着咨询个人和社区，还意味着将他们置于影响其自身发展的决策、包括发展筹资决策的中心地位。事实上，在指导方针中，

报告员将发展视为一个整体进程，需要不同的利益攸关方，包括国家、国际组织、民间社会、学术界成员和私营部门的投入和参与，以实现可持续成果。参与性协商进程向社会所有阶层开放，每一步都须经过考虑、加以预算、予以落实。

9. 指导方针明确指出，从发展权的角度来看，发展筹资意味着为个人和社区确定的发展优先事项筹集资金，因为他们必须推动自身发展进程。在下一节，特别报告员对相关国际标准如何采用这一做法作了说明。

10. 为了收集权利持有人在多大程度上处于发展筹资决策中心地位方面的信息，特别报告员呼吁会员国、发展筹资机构、非政府组织、智囊团和学术界提交资料。他想了解在参与和获取信息、资源调动和国际合作问题方面涉及发展筹资的实践和挑战。

11. 特别报告员感谢为编写本报告提供投入的所有国家和其他利益攸关方。¹ 由于大流行病实施的旅行限制，特别报告员无法登门咨询，转到网上与有关利益攸关方举行了多次协商。² 他确认，2020 年席卷全世界的 COVID-19 大流行要求许多国家重新调整资源，但遗憾的是，收到的资料却没有增多。如有更多资料，他便可提供更多的良好做法范例，供各国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调整使用。

B. 发展筹资和发展权的国际政策背景

12. 适用于发展权与发展筹资交汇点的国际政策背景包括《发展权利宣言》、《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见 [A/HRC/36/49](#))。

13. 根据《发展权利宣言》，由于发展权，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和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第 1 条)。《宣言》载有指导发展筹资政策决定的原则。例如，其中规定，社区应对其自然财富和资源拥有完全主权(第 1 条)，发展的惠益应公平分配(第 2 条)。呼吁各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实现发展权利，并确保人人机会均等(第 8 条)。此外，在国际一级，各国义务相互合作，既要促进发展中国家更迅速的发展，又要消除全面发展的障碍(第 3 条第 3 款和第 4 条第 2 款)。

14. 在联合国会员国 2015 年通过的《2030 年议程》中，发展权与可持续性之间有着切实联系。《2030 年议程》全文重申了《发展权利宣言》的关键原则。³ 《2030 年议程》确认了需要建设和平、公正和包容的社会。这一社会的基础是，尊重包括发展权在内的人权，在各级有效实行法治和善政，建立透明、有效和负责任的机构。

15. 大会第 [69/313](#) 号决议认可的《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与《2030 年议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前者为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内的可持续发展筹资提供了全球框架。与《2030 年议程》类似，《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也提到人权

¹ 提交的资料可查阅：www.ohchr.org/EN/Issues/Environment/SREnvironment/Pages/SafeClimate.aspx。

² 本报告依据 2020 年 3 月至 7 月查阅到的信息。

³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人权高专办)，“纪念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 33 周年声明”，2019 年 12 月 4 日。

和基本自由、善政、法治和诉诸司法，将其作为促进和平、包容性社会的总体承诺的组成部分。因此，发展权的基本要素是发展筹资国际框架的基础。

16. 这些国际标准表明，各国以前承诺对可持续发展和发展筹资采取基于人权的办法。在以下各节中，特别报告员审查了在发展筹资领域落实发展权的具体实例，以证明各国如何将这些承诺付诸实践，以及在哪些方面需要作进一步努力。

三. 国际和区域两级的发展筹资实践

A. 参与、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以及获取信息

17. 在过去三十年中，多边开发银行和多边发展筹资机构创建了一系列环境和社会保障措施，除其他外，规定与受影响人口进行协商，征得社区和人民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以及获取信息。这些规范框架建立了一套日益标准化的基准，大多数官方部门资金提供者在其业务中遵守这套基准，如尽职调查、环境和社会影响评估以及与受影响人口进行有意义协商等标准。与此同时，许多官方发展筹资机构还建立了机构申诉机制，又称独立问责机制，为个人和社区提供平台，使其能够就违反这些标准的行为，包括缺乏协商、无法获取信息等寻求补救。

18. 一组学者在提交特别报告员的一份资料中指出，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国际金融公司)在业绩标准⁴中纳入了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原则，这是最佳做法的一个范例。然而，尽管国际金融公司的贷款协议和发展项目中纳入这一原则是标准做法，但并不总是或不一定能确保可持续的纳入。有三个关键原因。首先，业绩标准只是作为一个手段写入贷款协议。根据这些标准的条款，资金提供者可以通过拖欠提供贷款或放弃要求与受影响社区协商的条款等，对项目的实施施加影响。其次，如果国际金融公司的资金在国家一级的支付是通过其他平台如多利益攸关方伙伴关系或公私伙伴关系进行的，那么，国际金融公司的标准往往会受到国家、国家以下或地方项目一级的问责框架的破坏或忽视。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框架来确保这些私人投资符合环境和社会保障的共同标准，包括国际法律文书所载的标准和不具约束力的标准，如《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跨国公司准则》和《负责任投资原则》。在支付私人发展资金方面广泛使用金融中介也使官方资金提供者与发展项目的预定受益者之间有距离，因而很难确保保障政策和标准在整个筹资链中得到遵守。第三，与公共部门通过官方拨款或贷款开展的项目相比，私营部门的项目较为不透明。

19. 欧洲投资银行是一家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有业务的主要发展筹资机构。监测欧洲投资银行做法的民间社会组织表示，该银行关于利益攸关方有意义互动和公众参与标准中的规定与实地做法之间存在差距。⁵ 例如，尽管为发展项目制定了法律框架，要求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估，但由于缺乏一致的监测，不一定转化为与当地社区的有意义的接触。此外，即使广泛的社区支持是项目文件中的一个明

⁴ 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向特别报告员提交的资料，2020年3月。

⁵ Coutner Balance 向特别报告员提交的资料，2020年5月31日。

确目标，也不一定总能确保人权得到尊重。如果不包括人权保护条款，社区支持从本质上而言就不是一个适当的目标。此外，欧洲投资银行提议纳入的自由、事先和知情参与权不同于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权。因此，受影响的社区或许能够与政策制定者和规划者接触，却不能拒绝或抵制项目。这种区别意味着，即使有公众参与的原则和程序，就算理由充分，也可能无法反对一个发展项目。

20. 在参与、获取信息以及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方面的主要挑战有，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缺乏关于资助项目的具体行为者的信息，以及没有一个跨国、国家和地方项目资金提供者的普遍和标准化的投诉和问责机制。⁶ 此外，由于难以监测所述原则和规定在实地是否得到切实执行，导致人们质疑发展筹资机构的政策是否真正得到执行，弱势群体是否参与。报复问题和报复风险也是关键挑战，因为受影响的社区并不总是有申诉的安全空间。关于问责制，并不是所有的发展筹资机构都有防止竞相逐底的争端解决机制，即原则和规定不那么严格的机构受到金融中介，如私人公司、影响力投资者和私人银行的追捧。

21. 关于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发展筹资审议进程的政府间会议、谈判和讨论并获取信息，民间社会组织报告了各种制约和挑战。⁷ 在非正式和正式的发展筹资对话、讨论和会议中，国家、区域和国际组织的参与往往不均衡，国际和发达国家民间社会组织的参与比例过高。非英语民间社会组织因有语言障碍，很难参加非正式对话和谈判，因为这些对话和谈判并不总是提供翻译。区域利益攸关方，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区域利益攸关方在分析、宣传和提高认识方面存在差距，因而难以开展有意义的参与。

22. 此外，联合国发展筹资审议进程的实质性内容技术性很强，主要允许宏观经济债务和金融政策方面的技术专家，而不是社区活动家和社会运动领袖的实质性参与。发展中国家的地方和自治组织表示，他们感到被排除在发展筹资讨论的实质性进程之外。⁸ 对于这些组织而言，转达主权债务、非法资金流动和私人融资等系统性经济和金融政策问题如何对当地人民的实际生活产生影响，有时是一项挑战。

23. 此外，各区域民间社会组织的代表性及其技术专长水平也往往不平衡，造成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筹资讨论的实质性内容与发展中国家的当地现实脱节。对于宏观经济和金融政策如何成为跨部门和性别不平等的结构性驱动因素的论述也不够充分。⁹ 这往往源于大会内部的地缘政治力量平衡，以及会员国在大会的决定和立场缺乏社区一级的参与。

24. 参与发展筹资审议进程的民间社会组织也对性别平等问题，特别是在财政资源分配方面纳入不足表示关切。尽管发展筹资问题妇女工作组为联合国的发展筹资审议进程和辩论提供了实质性内容，妇女权利组织的工作却没有得到足够的资金。

⁶ Accountability Counsel 与特别报告员的协商，2020年5月8日。

⁷ Equidad 与特别报告员的协商，2020年5月27日；拉丁美洲经济和社会正义网与特别报告员的协商，2020年5月29日；欧洲债务和发展网络与特别报告员的协商，2020年6月2日。

⁸ 拉丁美洲经济和社会正义网与特别报告员的协商，2020年5月29日。

⁹ Equidad 与特别报告员的协商，2020年5月27日。

B. 调动国内和国际资源

25. 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目标 17 中，各国承诺加强执行手段和振兴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其中包括加强政策协调和连贯性，尊重各国在制定和执行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政策方面的政策空间和领导力(具体目标 17.13、17.14 和 17.15)。调动国内和国际资源包括与非法资金流动和税务政策、官方发展援助或援助政策和私人融资有关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领域。这些领域的共同目标是为可持续发展筹资，其中包括《2030 年议程》的 17 个目标，如消除贫困和解决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

26. 国际社会认为，非法资金流动是全球经济中一个突出的系统性问题，导致大量资金从发展中国家流出，限制了发展中国家调动国内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非法资金流动包括跨国公司的逃税和避税、洗钱以及从贿赂、腐败和犯罪活动中转移资金。对“非法资金流动”一词没有单一的、普遍接受的定义。迄今为止，联合国尚未明确界定这一术语(A/HRC/36/52，第 5 段)。人权理事会咨询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任何有意义的正当资金流动定义，均需对“不正当”一词作出范围更广的、两个层面的解读。在第一层解读中，“不正当”系指非法获得、转移或利用资金，其中包括所有违反相关国家或国际法律框架、导致居民海外资产累积的未登记私人资金外流情况(同上，第 7 段)。非法资金流动对调动国内资源为可持续发展筹资以及享受包括发展权在内的人权构成重大障碍。

27. 发展筹资问题机构间工作队报告说，自 2015 年以来，一些重要领域的税务政策和国际合作有所改善。¹⁰ 然而，《2030 年议程》实施五年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并没有见到全面积极的改革。国内公共资源调动方面虽有缓慢、稳步的进展，但不足以与《2030 年议程》的规模和雄心相匹配。2015 年至 2018 年，只有约 40%的发展中国家明显提高了国内生产总值税负率。改革的政治意愿和能力建设援助不足，同时在支出分配和预算过程中，可持续发展尚未被普遍列为优先事项。各国打击税务、腐败相关和其他类型的非法资金流动的有效国家行动包括：提高预防和调查各类可疑交易的能力；在国家执法方面进行更有效的跨机构协调；更加认真地履行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作的国家承诺。

28. 在全球一级，旨在解决非法资金流动的政策改革和努力要求就非法流动的各个方面进行国际合作。自发的信息共享和法律互助是其中极为重要的行动。截至 2019 年底，超过四分之三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包容性框架”成员引入了国别报告申报要求。因此，几乎每一个集团综合收入超过 7.5 亿欧元的跨国企业都在为其母国司法管辖区编写国别报告。然而，东道国司法管辖区只有通过同意另一项国际文书并进行双边匹配，才能获得非当地的国别报告。截至 2019 年 11 月底，在国别报告方面建立了 2 000 多个双边信息交换关系；其中 933 个涉及中等收入国家，高于 2018 年的 745 个和 2017 年的 477 个。目前，没有一个最不发达国家通过信息交换收到国别报告。¹¹

¹⁰ 《2020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20.I.4)。

¹¹ 同上。

2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称,非法资金流动会危及国家和全球的经济和金融稳定。¹² 例如,它们会耗尽外汇储备,影响资产价格,降低税收,减少政府收入。它们挪用公共开支的资源,可能削减可用于私人投资的资本。破坏稳定的流动会对更广泛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且有可能波及其他经济,因为它们往往是跨国界的。在过去二十年中,货币基金组织帮助制定了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国内和国际政策。五十多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在提供技术援助,促进税务合规和执法,并在加强法律框架和行政手段上与若干国家进行了合作。基金组织大力开展技术援助,帮助成员国防范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并提供技术援助,帮助各国更好地了解流动规模。

30. 非洲非法资金外流问题高级别小组在其 2015 年报告中强调,非洲大陆的非法资金外流从 2001 年的约 200 亿美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600 亿美元。¹³ 近年来,这些资金一直在破坏非洲区域国内资源的调动,在此期间,对非洲国家的援助不是停滞不前就是减少。它们对实现非洲大陆每个男子、妇女和儿童的权利有潜在的影响。据世界银行称,非法资金流动及其背后的活动扭曲经济和政治竞争,颠覆政府机构,造成冲突和暴力,破坏法律和金融体系的廉正。¹⁴ 非洲经济委员会发现,流出非洲区域的非法资金数量一直大于收到的官方发展援助。¹⁵

31. 随着电子商务和数字商业模式的增长,数字经济的税收已经成为调动国内资源的中心问题。¹⁶ 电子商务领域往往通过对间接税和直接税的挑战,造成国家财政制度的颠覆。关于跨国公司利润的征税,数字化改变了对根据居住地和来源地征税的要求,因为现在在一个市场的运营更容易不触发税收居住地规则。在传统的税务规则中,来源国的征税通常依据的是在该司法管辖区的实际存在。对跨国企业的征税权一旦确立,其利润就会在各司法管辖区之间根据独立交易原则(即用市场价格对集团内部交易进行估值)进行分配。这样的市场价格可能无法充分反映高度数字化企业创造的价值,因为在这些企业中,无形且往往没有定价的资产是价值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与数字用户的互动为企业创造经济价值。这产生了以下问题,即什么是适当的经济参与门槛值,以证明一个司法管辖区有正当的公司所得税征税权利,以及什么是最适当的利润分配方法。

32. 非法资金流动对发展权产生影响,因为主要国家违反其域外义务,继续为避税和逃税提供便利和许可。¹⁷ 因此,打击逃税和避税不仅是政治决定,更是人权

¹²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与打击非法资金流动”,2020年3月12日。

¹³ 非洲联盟和非洲经济委员会,“非法资金流动:非洲非法资金外流问题高级别小组的报告”。

¹⁴ 世界银行,“世界银行集团对非法资金流动的回应:盘点情况”,2016年3月。可查阅:<https://documents.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documents-reports/documentdetail/502341468179035132/the-world-bank-group-s-response-to-illicit-financial-flows-a-stocktaking>。

¹⁵ 非洲经济委员会与特别报告员的协商,2020年6月5日。

¹⁶ 《2020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

¹⁷ 经济和社会权利中心与特别报告员的协商,2020年5月29日。

义务。例如，一个民间社会组织对一些国家建立金融保密管辖区的做法表示关切，因为这可能违反其海外保护人权的域外义务。¹⁸

33. 关于调动国际资源，官方发展援助或国际发展援助被定义为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福利而进行的官方资金转移。¹⁹ 通过发展筹资原则，优质优惠资源的获取和发展伙伴关系的有效性在实现发展权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在这方面，官方发展援助对发展筹资至关重要，而履行 40 多年前作出的承诺，实现将国民总收入的 0.7% 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的目标，仍然是成功的基石。官方发展援助从 2017 年的 1 530 亿美元降至 2018 年的 1 493 亿美元，下降了 2.7%。²⁰ 特别是对非洲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下降了 4%。作为国民总收入的一部分，所有援助国的官方发展援助平均约为 0.31%，远低于联合国 0.7% 的目标。²¹ 此外，在实现国家自主权、包容各方的伙伴关系、透明度和相互问责等发展实效原则方面进展缓慢。²²

34. 世界银行集团制定了一种被称为“最大限度地利用发展筹资”的全机构办法，以便系统地利用所有资金来源、专门知识和解决方案，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增长。世界银行认为，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各国的资源需求超过了其自身预算和现有的捐助者供资。²³ 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筹资需要从所有可能的资金、创新和专门知识来源，特别是私营部门找到解决方法。较富裕国家的私营部门掌握大量资本，这些资本可发挥更大作用。2017 年 3 月，二十国集团财长批准了一套原则，为世界银行集团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提供了一个增加私人投资以支持各国发展目标的框架。²⁴ 世界银行集团制定这些原则，以产生有助于解决投资者风险的工具。这类风险缓解措施使各国能够吸引和管理私人解决方案，扩大其筹资努力的选择范围，以便可持续地发展经济、减少贫困和扩大机会。

35. 非洲开发银行(非行)的资源调动直接来自非洲区域的成员国政府。²⁵ 非行只能以赠款捐助的形式接受私人捐款。银行贷款、担保、银团和其他手段提供了一个健全的治理结构，确保了效率和效力。通过谅解备忘录，非洲开发银行与伊斯兰开发银行等行为者一起利用财政资源。非行特别关注最贫穷的人，例如，在危机时期通过资助和实施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帮助穷人。

¹⁸ 同上。

¹⁹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什么是官方发展援助？”，2020 年 4 月。

²⁰ 经合组织，“2018 年发展援助减少，特别是对最需要援助的国家”，2019 年 4 月 10 日。

²¹ 同上。

²²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与特别报告员的协商，2020 年 5 月 14 日。

²³ 世界银行集团，“最大限度地利用发展筹资”。可查阅：
www.worldbank.org/en/about/partners/maximizing-finance-for-development。

²⁴ 二十国集团，“关于 G20 经济体复原力原则的说明”，2017 年 3 月 18 日。可查阅：
<https://www.newsd.admin.ch/newsd/message/attachments/47572.pdf>。

²⁵ 非洲开发银行与特别报告员的协商，2020 年 6 月 12 日。

36. 一个学术团体在提交特别报告员的资料中指出，在没有适当的监管和治理框架的情况下，转向私人进行可持续发展筹资有可能破坏根据国际协定作出的国际承诺，这些协定包括《2030 年议程》、《2015-2030 年减少灾害风险仙台框架》、《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和 2005 年《援助实效问题巴黎宣言》。²⁶ 尤其是来自卫生和农业部门的证据表明，筹资平台中的私营部门行为者往往会将资金从国家或政府间优先事项转用于捐助者和私营部门的利益。商业利益的介入会造成追求私人利益与国际发展筹资的公共目标之间的冲突。

37. 此外，对金融中介的依赖性增加，有可能产生不稳定，因为商业银行没有充分认识到它们在造成或助长对人权、包括发展权的不利影响方面的潜在作用。在这方面，执行《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具有重大潜力，可以确保在商业银行、国际金融机构和发展筹资机构的活动和交易对人权产生不利影响时，特别是在缺乏社会和环境保障的情况下，提供有效的补救措施。

38. 公私伙伴关系由政府与私营公司之间的合同组成。根据合同，公司资助、建设和经营公共服务的某些部分，并通过用户支付的费用或公共当局的付款获得报酬。除其他外，全球机构和各国政府正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公私伙伴关系。开发银行、各国政府和捐助机构正在专门为公私伙伴关系提供补贴性公共资金。民间社会组织和一个国际工会联合会提交的资料指出，根据它们过去 15 年的经验，公私伙伴关系是一种昂贵、低效的基础设施筹资方式，并且转移了政府对其他公共服务的支出。²⁷ 它们掩盖了公共借款，同时向私营公司提供了国家担保的长期利润。积极的一面是，有证据表明，在通过公私伙伴关系将个人和社区权利持有人纳入项目的规划和施工前阶段，包括向权利持有人提供信息方面作出了努力。²⁸

39. 如不同的民间社会组织所强调，近几十年来公共财政政策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是，导致经济紧缩效果的财政整顿政策所带来的挑战。²⁹ 发展筹资机构以及捐助国政府执行的这种经济政策要求或建议往往涉及取消或减少补贴，包括对燃料、农业和食品的补贴；削减公共部门的工资，特别是教育、卫生和其他公共部门工人的工资，并设定上限，这些人在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工资总额中占很大比例；合理制定社会安全网和保险方案、养恤金、住房福利、儿童福利和残疾福利并加强其针对性；扩大消费税，如对贫困家庭消费比例过高的基本产品征收增值税。³⁰

²⁶ 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向特别报告员提交的资料，2020 年 3 月。

²⁷ 欧洲债务和发展网络与特别报告员的协商，2020 年 6 月 2 日；David Hall, “Why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don’t work: the many advantages of the public alternative”, 公共服务国际组织委托撰写的报告，2015 年 2 月。

²⁸ 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向特别报告员提交的资料，2020 年 3 月。

²⁹ Gestos 与特别报告员的协商，2020 年 5 月 21 日；拉丁美洲经济和社会正义网与特别报告员的协商，2020 年 5 月 29 日；经济和社会权利中心与特别报告员的协商，2020 年 5 月 29 日；欧洲债务和发展网络与特别报告员的协商，2020 年 6 月 2 日。

³⁰ Isabel Ortiz and others, “The decade of adjustment: a review of austerity trends 2010-2020 in 187 countries”, 扩大社会保障系列，工作文件第 53 号(日内瓦，国际劳工组织，2015 年)。

40. 正在进行的研究发现，有进一步的证据表明，通过实施低通胀和赤字目标以及冻结或削减公共部门的工资总额，公共工资总额普遍受到抑制，对卫生、公共服务和医疗造成了影响。³¹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困扰只会加剧因长期削减开支造成的对公共系统和服务的侵蚀。几个低收入国家的偿债支出超过了教育和医疗支出的总和。³² 财政紧缩的社会成本很高，例如，公共卫生和教育系统削弱，获得基本社会服务的机会减少，公共部门的生计丧失，无偿工作和时间贫困的增加。³³ 国家削减预算往往会减少或取消主要惠及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或病患者的方案和服务。

41. 在发展筹资中转向私人融资，通过公共和私人治理模式引入新的条件形式，这可能与各国根据国际法，包括国际投资法、土著人民权利、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保护标准作出的现有承诺相冲突。³⁴ 新的发展筹资框架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调整法律和监管结构，为私人投资创造有利的国内环境。然而，这些监管改革可能会使各国无意中或以其他方式面临国际贸易和投资法规定的责任。在这方面，非洲开发银行的做法是，不对其 54 个非洲区域成员国施加结构调整条件。³⁵ 非行的投资以政策对话为基础，由每个成员国的所有权份额决定，其中最大的股东是尼日利亚、埃及、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³⁶ 非洲开发银行是一家主要由非洲股东出资的区域性银行，因此能够有效地调动区域的金融资源。

C. 国际合作

42. 国际合作是发展筹资原则和发展权的核心。《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指出，全球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本身就是加强国际合作的载体。政府间对话和会议在联合国发展筹资审议进程中的作用是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以实现不让一个人掉队的可持续发展现实，植根于相互支持的世界贸易、货币和金融体系，加强和改进全球经济治理，以及人人利用知识和技术。

43. 合作义务是《发展权利宣言》的核心，这反映在《宣言》的组成条款中，其中规定了国家的责任，如国家有权利和义务制定适当的国家发展政策，目的是不断改善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的福利(第 2 条第 3 款)，各国对创造有利于实现发展权利的国家和国际条件负有主要责任(第 3 条第 1 款)，各国在确保发展和消除发展的障碍方面相互合作(第 3 条第 3 款)。《宣言》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其中呼吁开展国际合作，解决与和平与安全、人权和发展有关的国际问题；《世界

³¹ ActionAid, *Who Cares for the Future: Finance Gender Responsive Public Services!*(约翰内斯堡, 2020 年 4 月)。

³² 同上。

³³ Shahrarazavi, “Rising economic and gender inequality: intersecting spheres of injustice”, 《2016 年世界社会科学报告：挑战不平等——通向公正世界之路》(巴黎,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2016 年)。

³⁴ *New Frontier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向特别报告员提交的资料, 2020 年 3 月。

³⁵ 非洲开发银行与特别报告员的协商, 2020 年 6 月 12 日。

³⁶ 同上。

人权宣言》，其中设想建立一个人人都能充分实现所有权利和自由的社会和国际秩序；《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其他国际文书。

44.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呼吁多边开发银行和发展筹资机构更好地利用其资产负债表，以增加对可持续发展的贷款。2018年，多边开发银行的贷款总额增加了4.7%，达到719亿美元，主要来自世界银行集团国际开发协会的优惠贷款约占总额的18%，受援国大多为最不发达国家，占67%。³⁷ 2019年12月，国际开发协会成功为2021-2023财年补充了820亿美元，非洲开发银行股东批准增资1150亿美元，为1964年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³⁸ 非洲开发基金作为非洲开发银行的优惠基金，也为2020-2022年期间补充了76亿美元，比上一周期增加了32%。

45. 域外义务，即政府跨越国界的义务，是国际合作的一项核心人权原则。根据《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二条第一款，各国必须各自并藉国际协助与合作采取步骤，逐步完全实现《公约》承认的各项权利。³⁹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政府有三类域外义务。⁴⁰ 第一，国家有义务尊重权利，或不干涉人民的权利或另一国政府履行其义务的能力。第二，国家有义务保护权利，或通过规范公司和其他行为者的行为或以其他方式影响其行为，防止公司和其他行为者在外国干涉人民的权利。第三，国家有义务履行权利，或进行国际合作，以支持各国政府履行其人权义务。这些义务是在不同情况下触发的。当政府对海外人民权利具有决定性影响时即为一例。⁴¹ 这包括当政府作为国际组织成员行事，而这些国际组织可以有效地迫使政府采取损害人权的政策时，各国不得通过这些组织来规避其人权义务；相反，各国必须坚持国际组织行事应符合人权的立场。⁴²

46. 《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认识到，需要扩大国际税务合作，作为对国家税务政策和行政改革的补充。金融活动的全球化和技术的进步减少了货物和资金流动的壁垒，因此各国必须在税务问题上共同努力，打击非法筹资。通过合作，各国可以应对企业和个人避税和逃税的挑战，同时通过公平分配征税权鼓励投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打击合法避税活动为国际税务合作作出了贡献，这主要是通过监测非法资金流动，以及在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上向决策者提供援助。⁴³ 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倡议由二十国集团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于2013年7月发起，是最具影响力的国际税务改革努力之一。它以15点行动计划为基础，要求各国逐一报告进展情况。然而，向特别报告员提交的对该倡议的主要批评意见是，该倡议没有涵盖对低收入国家影响最大的问题，这些国家每年因跨国

³⁷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与特别报告员的协商，2020年5月14日；《2020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

³⁸ 《2020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

³⁹ 另见《儿童权利公约》第4、24和28条；《残疾人权利公约》第32条。

⁴⁰ 见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生命权的第36号一般性意见(2018年)(CCPR/C/GC/36)，第63段。

⁴¹ 经济和社会权利中心与特别报告员的协商，2020年5月29日。

⁴² 同上。

⁴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特别报告员的协商，2020年5月22日。

企业逃税损失的收入估计达 5 000 亿美元。⁴⁴ 另一个重要批评是，经合组织并非建立在所有国家普遍加入的基础上；相反，其成员大多为发达国家。⁴⁵ 因此，经合组织无法代表不成比例地经历非法资金流动的低收入国家，对后者也并无明确责任。

四. 应对 COVID-19 大流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47. COVID-19 大流行造成前所未有的全球公共卫生和经济危机，其严重程度无法估量。由于世界经济和人类社会的大部分地区暂停了几个月，每个国家都遭遇困境。这造成制造业、贸易、旅游业、旅行、零售和商业的急剧萎缩和大规模失业。预计 2020 年全球经济将萎缩 5.2%，170 个国家人均经济出现负增长。⁴⁶ 预计未来两年内，世界经济付出的经济影响代价约为 9 万亿美元。⁴⁷ 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全球贫困将出现自 1998 年以来的第一次增加。世界银行预计，到 2020 年底，至少有 5 亿人可能陷入贫困，约 6 000 万人可能陷入极端贫困。南亚将经历 40 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撒哈拉以南非洲将出现 25 年来的首次衰退，整个非洲大陆近一半的就业岗位将消失。⁴⁸

48. 根据《世界人权宣言》，保证人人享有一个有利于实现其权利的社会和国际秩序。大多数政府都签署了具有约束力的人权条约，承诺不加歧视地保障人民的权利。在当前 COVID-19 大流行的背景下，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需要国际合作。然而，迄今为止，各国之间的国际合作程度不足。相反，各国正在倒退到旨在保护其国内利益的政策上，而不考虑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个人防护设备、检测试剂和呼吸机等急需的医疗用品被拍卖给出价最高者，而不是送到最需要的地方。⁴⁹ 此外，一些富裕国家正在禁止出口这些必需品。⁵⁰ 这种行动可能会对依赖这些进口的国家的人民生活产生破坏性影响。

4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这一大流行病的经济影响作出了即时反应，着重通过灾难控制和救济信托，向 25 个低收入国家提供延期还本付息，或暂停偿还债务。⁵¹ 该信托基金提供约 5 亿美元赠款，用于支付对货币基金组织为期六个月的债务欠款，使最贫穷国家能够将稀缺的财政资源用于紧急医疗和经济需求。将通过该信托基金获得债务减免的国家有：阿富汗、贝宁、布基纳法索、中非共和国、乍得、

⁴⁴ 都柏林大学学院 Siobhán Airey 向特别报告员提交的资料，2020 年 2 月。

⁴⁵ 国际开发协会与特别报告员的协商，2020 年 5 月 5 日。

⁴⁶ 世界银行，“COVID-19 将使全球经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新闻稿，2020 年 6 月 8 日。

⁴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大停摆》(2020 年 4 月)。

⁴⁸ 世界银行，“COVID-19(冠状病毒)将撒哈拉以南非洲推向 25 年来首次衰退”，新闻稿，2020 年 4 月 9 日。

⁴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大停摆》。

⁵⁰ 世界银行，“COVID-19 将使全球经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⁵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局批准立即减免 25 国债务”，新闻稿，2020 年 4 月 13 日。

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海地、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莫桑比克、尼泊尔、尼日尔、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拉利昂、所罗门群岛、塔吉克斯坦、多哥、也门。货币基金组织领导层敦促捐助者进一步增加信托基金的资源，为上述受援国提供整整两年的额外偿债减免。货币基金组织还宣布扩大对发展中国家成员国的贷款机制，以满足它们对公共卫生和国民经济更大的财政需求。货币基金组织已将其快速信贷机制的贷款额度从年度特别提款权国家配额的 50% 提高到 100%，从 2020 年 4 月至 10 月累计提高到 150%。货币基金的紧急筹资，包括其快速融资工具，预计将达到约 1 000 亿美元。

50. 特别报告员征求过意见或提交过书面意见的几乎所有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组织都认为，主权债务负担是调动资源应对这一大流行病的主要挑战。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疫情对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的有害影响，预计许多受债务困扰最严重的国家将在 2020 年代出现偿债违约。⁵² 截至 2019 年底，在有资格使用“减贫和增长信托基金”的较贫穷经济体中，有近一半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估为面临主权外债债务困扰高风险或已陷入债务困境。⁵³ 仅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发展中国家整体公共外债偿还额估计接近 3.4 万亿美元。⁵⁴ 民间社会组织强调，二十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暂停偿债是不够的。他们主张完全取消债务或采取债务豁免措施，以缓解 76 个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严重债务困扰。150 多个民间社会组织签署了一封请愿信，呼吁所有债权人，包括双边债权人、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私人债权人取消债务。⁵⁵

51. 世界银行已经制定了 140 亿美元的快速通道一揽子计划，以应对发展中国家当前的卫生和经济需求。⁵⁶ 该机构设想提供高达 1 600 亿美元的资金，专门用于发展中国家应对未来 15 个月将面临的卫生、经济和社会冲击。国际开发协会的 500 亿美元资源将以赠款和高度优惠条件提供给最贫穷国家。世界银行集团的业务将强调以即时现金转移、减贫和政策性融资为形式的社会保障。世界银行集团认为，私营部门对于遏制危机和支持经济复苏至关重要。在这方面，国际金融公司将试图通过 80 亿美元的快速通道融资来缓解对发展中国家小企业的经济影响，重点是为近 300 家已请求支持的公司保留就业。

52.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强调，目前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如何扩大优惠融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所需的流动资金，以应对这一大流行病的经济影响。⁵⁷ 鉴于货币暴

⁵² 国际货币事务与发展二十四国政府间小组公报，2020 年 4 月 14 日。可查阅：www.g24.org/wp-content/uploads/2020/04/G-24-Communique-Final-Spring-Meetings-2020.pdf。

⁵³ 见 www.imf.org/external/Pubs/ft/dsa/DSAlist.pdf。

⁵⁴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COVID-19 事关生命和债务，需达成全球协议”，2020 年 4 月 23 日。

⁵⁵ Jubilee Debt Campaign, “A debt jubilee to tackle the COVID-19 health and economic crisis”, 2020 年 4 月。可查阅：<https://jubileedebt.org.uk/a-debt-jubilee-to-tackle-the-covid-19-health-and-economic-crisis-2>。

⁵⁶ 世界银行，“世界银行集团是如何帮助 COVID-19(冠状病毒)的国家的”，概况介绍，2020 年 2 月 11 日。

⁵⁷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与特别报告员的协商，2020 年 5 月 14 日。

跌和发展中国家资本外流的历史记录，筹资需求激增。人们普遍认为，基金组织新发行的特别提款权储备货币对资助 COVID-19 的应对至关重要，正如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发行的货币那样。紧急筹资措施和资本账户监管也至关重要。关于债务，短期内需要减免和取消债务，长期则需要建立一个重组机制。重要的是，所有会员国必须在联合国继续进行这些讨论。

53. 同时，调动国内和国际资源目前因各国对加税缺乏兴趣或缺乏加税意愿而受阻。在调动国内资源方面，丧失的财政资源是联合国会员国目前的主要关注点，正在通过联合国国际金融问责、透明和廉洁以利实现 2030 年议程高级别小组等政府间进程加以解决。许多国家的一个主要关切是，应对 COVID-19 危机的筹资和流动性工具将以实施紧缩政策为条件。尽管私人投资在短期内几近崩溃，但未来公共和私人资金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定义。⁵⁸ 公共资金和私人资金的作用明显不同，私人资金不能轻易取代公共资金。在这方面，应该重新调整发展筹资中的公共和私人平衡。国家的作用至高无上，这一点在各国 COVID-19 的应对中已经看到。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已经说明，不同类型的资金用途不同，不能轻易用一种资金代替另一种资金。⁵⁹ 需要强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私人资金与公共资金的适当用途。私人融资并不适合所有的筹资需求，必须更多地考虑如何管理私人融资的风险，特别是公共部门和国家官方账户中或有负债费用方面的风险。

54. 非洲经济委员会在提交特别报告员的一份资料中详细说明，尽管发达国家已经向 COVID-19 卫生、社会安全网和经济刺激对策注入了数万亿美元，但非洲严重缺乏作出类似反应的财政空间。⁶⁰ 非洲在财政上受到四项重大挑战的制约：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财政赤字高、借贷成本高，以及许多非洲货币对欧元和美元贬值。尽管亟需采取财政对策来防止区域经济崩溃，非洲缺乏财政灵活性或政策空间。由于一些关键的区域因素，如偿债义务估计为 480 亿美元、对石油出口收入的依赖和国际油价暴跌、依赖商品出口的经济体缺乏多样化以及旅游业下降等对非洲各经济体造成的影响，在最好情况下，非洲的增长可能放缓至 1.8%，最坏的情况下可能收缩 2.6%。⁶¹ 这有可能使该区域 2 700 万人陷入极端贫困。

55. 国际和区域合作对非洲经济的应对和复苏至关重要。据非洲经济委员会称，非洲国家正在请求提供 500 亿美元来加强非洲的卫生部门。⁶² 鉴于非洲目前约有 94% 的药品是进口的，许多国家正在集中力量支持国内药品生产者，而这需要流动资金。非洲国家还在研究包括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在内的区域和全球筹资行为者如何建立政治意愿，采取集体行动，支持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特别提款权，以满足发展中国家对当前资金流动性的需求。⁶³

⁵⁸ 同上。

⁵⁹ 《2020 年可持续发展筹资报告》。

⁶⁰ 非洲经济委员会，“COVID-19 in Africa: protecting lives and economies”，2020 年 4 月。

⁶¹ 同上。

⁶² 非洲经济委员会与特别报告员的协商，2020 年 6 月 5 日。

⁶³ 非洲开发银行与特别报告员的协商，2020 年 6 月 12 日。

五. 结论和建议

A. 参与、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以及获取信息

56. 强调有意义的公众咨询是发展筹资机构规划、评估和监测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报告员建议将公众咨询纳入发展筹资机构的所有领域，避免出现项目创办人承担大部分协商责任的情况。

57. 特别报告员敦促，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原则应适用于涉及土地和自然资源投资的项目，作为所有受影响社区的标准良好做法。他重申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建议，即在农村妇女土地上实施发展项目之前，所有农村妇女应享有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权利。发展筹资机构应考虑建立和实施一个制裁和行动工具箱，供在发展项目的金融中介不遵守其义务或本身参与报复当地社区的情况下使用，例如，可以在金融中介与发展筹资机构之间的合同中列入制裁条款。

58. 特别报告员支持加强大会关于发展筹资问题的实质性讨论，并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民间社会参与其中。解决语言障碍并促进将技术经济数据转化为平等、人权和政策行动的相关信息，可使联合国与受影响社区之间建立更有意义的联系。

B. 调动国内和国际资源

59. 特别报告员建议创建一个分析工具，供所有国家用于税收政策影响评估，以审查国际和国内税务制度如何促进或阻碍发展权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在制定这一工具时，应与国际税务合作专家委员会等机构以及公认的由发展中国家领导的专门知识中心(如非洲税务管理论坛)协商。

60. 必须将性别平等作为优先事项，因为税务政策并非不分性别或阶层。增值税等累退税对贫困人口、妇女、少数群体、残疾人、儿童和其他边缘群体造成了不成比例的伤害。生活在贫困中的妇女受到的影响特别大，因为她们无法公平地获得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此外，各阶层的妇女承担了大部分无酬照护工作，而在有偿工作中也存在性别工资差异。应审查多边开发银行和发展筹资机构向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向发展中国家发布的税务政策建议和条件，考虑它们对妇女收入和工作的影响，包括对无偿劳动和无酬照护工作以及财产和资产所有权的影响。会员国也应避免将税务竞争作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手段。

61. 关于调动国际资源，发展伙伴应再次承诺将国民总收入的 0.7% 用于官方发展援助目标，提供时间表和问责框架，包括在国家一级立法。发展伙伴还应将援助转到最需要的地方，并制定明确的行动和时限，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 50% 的官方发展援助。

62. 通过贷款、项目和涉及多边开发银行和发展筹资机构的其他筹资安排促进的公私伙伴关系，应接受对其发展成果的独立审查，包括对其人权和环境影响，以及资产负债表外债务累计情况的彻底审查。

63. 如发展筹资问题机构间工作队在《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中所强调，多边开发银行在执行《2030 年议程》方面的重要作用得到确认。2019 年，一些多边开

发银行顺利完成了资本补充。一些银行还采取了步骤，通过创新机制筹集更多资源。多边开发银行还加大努力，使其活动与《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和《2030年议程》对接。这些活动应继续进行并加大力度，以确保全面对接，包括与性别平等监测指标保持一致。特别是，公共开发银行有一项具体任务，即实现支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目标。公共开发银行应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将金融资源用于经济脆弱的生产部门，填补金融部门信贷供需缺口，通过发挥反周期作用促进经济稳定，并改善社会和人权保障。

C. 国际合作

64. 特别报告员敦促各国和私营企业有效执行国际劳工组织各项公约、《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和《经合组织跨国企业准则》，并建立有效的补救机制，以处理侵权行为和提供适当的补救，特别是为土著人民这么做。

65. 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报告员建议，衡量和评估具体目标 16.4 执行情况的指标应包括跨国企业的避税和逃税行为。

66. 关于国际税务合作问题，特别报告员建议设立一个包容各方、政府间的联合国税务委员会，赋予其任务和资源，以确保为促进有效调动国内资源进行合作。该委员会还应该处理与非法资金流动有关的所有问题，包括避税和逃税。普遍成员制意味着所有国家都将平等参与，这将有助于纠正有害的税务政策和做法，消除避税地、保密管辖区和其他便利非法资金流动的因素。

67. 各国必须本着加强和重续多边主义的精神进行合作，包括在联合国的进程和机制中进行合作。特别报告员建议，各国之间的国际合作和协调应考虑到域外义务或跨越国界的政府义务，这项人权原则对全球 COVID-19 大流行下实施跨界解决办法至关重要。

D. 应对 COVID-19 大流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68. 特别报告员强调在支持和保护发展权方面的核心挑战，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受到全球 COVID-19 大流行造成的经济挑战的影响不成比例。需要增加财政支持和低成本的流动资金，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紧急卫生对策和经济支持需求。

69. 特别报告员支持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继续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预算支助的快速支付。为解决发展中国家急迫的保健需求，为最脆弱者提供安全网，保护就业，并尽可能地支持经济活动，以无条件赠款形式提供的财政刺激实属必要。

70. 特别报告员敦促各国在应对这一大流行病的经济影响时，仔细区分私人资金与公共资金的适当用途，因为私人融资可能不适合所有的筹资需求。需要更好地管理私人资金的风险，特别是公共部门和国家官方账户中或有负债费用方面的风险。

71. 联合国的发展筹资审议进程应提供一个政府间平台，讨论、分析和协调这一大流行病及其对世界经济影响所需的多边应对措施和政策转变。特别报告员支持联合国作为一个论坛，制定短期、中期和长期实质性和注重行动的解决方法。